

18.10

云子面山景新



桃江文史资料

89

5
1988

目 录

我们是怎样迎接解放的	熊子俊 (1)
桃江大众文化社史略	严兆坤 (4)
战时简报	张碧如 (9)
广州起义亲历记	张 咏 (11)
抗美援朝从军记	曾质彬 (17)
刘汉初虎口脱险记	熊子俊 (21)
军校生活琐记	夏 霖 (24)
篾席发展中的一次斗争	李啸苏 (29)
建国前桃江地段的工业概况	习应山 (32)
修山面条简史	李先繁 (55)
桃江境内的资江航道今昔	薛政才 (58)
桃江民间公益事业今昔	徐巩华 (71)
完美的造型艺术——马迹塘的“故事”	谢楚有 (77)
桃江一中简史	吴子良 (81)
汤掬星先生与五卅中学	丁乐平 (91)
熊蓬洲传略	卢 岸 (96)
刘道美	张先尚 (101)

陶澍先生轶事.....	薛祚基 (103)
桃江桥.....	薛政才 (107)
建国前桃江地段的迷信活动.....	刘建纲 (110)
罗溪瀑布.....	薛石奇 (121)
编后.....	(123)

我们是怎样迎接解放的

熊子俊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雄师直趋武汉，进逼湖湘。此时我正从新化锡矿山工程处告假归里，随即与原地下党大栗港中心支部负责人张伯严联系，计划抓住时机，迎接解放。张嘱我赶快函召尚在澧县之熊固人书记速归，以便共商迎解事宜，我照办了。此后，不到十天，熊回来了。正当我们商议由我打入四县联防指挥部大队长张陆珍部充任中队长的時候，突然接到原中共大栗港支部第一任书记瞿然派专人送来的急信：要我们马上赶赴桃江官宝第“益阳县保安团”团部去，说有要事相商。第二天我和熊固人由原支部农运员熊克荣泛舟送到指定地点。瞿然一见我们，非常高兴，紧握着我们的手说：“十年未晤，不敢通音，现两弟年华正茂，处此大好形势之秋，有何打算？”我说：“形势喜人，特应召前来，不知仁兄有何吩咐？”寒暄片刻，便共进晚餐。不觉钟敲八点，我们便来到密室，外面由瞿然的爱人曾国芳同志放哨。首先瞿然同志讲：“我此次是奉中共湖南省工委军事组之命，来四县联防指挥部去协助肖曼平参谋长策反迎解的。路过益阳时被保安团团长熊建

助挽留。我现在手下无人，难于两头应付。欣闻两弟归里，故特飞请前来，共商大计。最好是除了大栗港支部人员全体参加外，还需发动部份失学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参加。”熊固人沉思片刻，经与我商量后提出：“大栗港支部人员只来一半，其余留作后勤。”他说：“熊建勋是黄浦军校六期学生，过去一贯与我党势不两立，万一他居心不轨，把我们一网打尽，去向老蒋献功时，尚有为我们报仇的。”瞿然同意了我们的安排。我和熊固人便启程返里，立即通知熊跃初、薛国平等同志进行发动。五天之内，就发动了进步教师詹龙香、周德禄及知青詹中诚、郭斌、习学贤等三十余人，来到保安团，成立政工队，由瞿然任队长。开展了募捐医药和筹集军粮等一系列的工作，并仿照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拟就了《保安团兵守则》，发布施行。

六月份，瞿然派我和熊固人赴省工委军事组方配似同志处领了书籍，还迎来了李大谟、杨建中、黎恕忠等三同志，以加强党的领导工作。为了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就在李、杨等人到达团部的第二天，由瞿然同志主持召开会议并作出决定：李大谟同志驻团部，掌握全盘；杨建中、黎恕忠去四县联防指挥部协助参谋长肖曼平开展工作；熊跃初同志负责联络；瞿然同志担任外线；熊固人任稽要专干；我和薛国平、詹中诚等下连队。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政治宣传。会后瞿然领李大谟拜会熊建勋团长，进行了政治谈判，议定了保安团与四县联防指挥部配合迎接益阳解放事宜，并派代表赴宁乡与姜亚勋部进行了联系。当时由于有白崇禧部71军的232师截断了宁益交通，保安团与姜部

无法会合。保安团便沿资江而上，尾截了103军的残部，收检了该部残散的一些军用物资。还派人偷听了驻大栗港232师康朴师长的电话，并令保安团随政工队的机炮连于大栗港附近资江两岸的山林里鸣枪示威。康朴不知底细，吓得撤离了大栗港。

七月中旬的一天半晚，瞿然领熊固人和我、由熊克荣船送修山肖曼平家，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了由肖曼平亲率四县联防指挥部起义和益阳的迎解工作等问题。但在我们行动之前，南下大军便解放了益阳。

八月初，我们收捡了国民党部队遗散在资江沿线的军药物资，全部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146师。便随保安团、四县联防指挥部官兵赴益阳改编。后来改编为湖南人民解放军益汉支队，由原四县联防指挥部指挥官谢家驹任司令员，原保安团团长熊建勋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肖曼平仍任参谋长，瞿然任政工室主任。原保安团政工队的人员由熊固人率领到莲花坪四野三八政治部学习。九月上旬学习结束，我们协助三八政治部开完庆功会后，便发动青年参军。当时有知识青年薛高中、朱诗迈、张育兰(女)等十余人参加。这些同志由薛国平率领随部队进军西南，熊固人等一部份同志留地方协助南下干部开展新区工作，我被调送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自此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责任编辑：夏家让]

桃江大众文化社史略

严兆坤整理

一、概述

桃江大众文化社成立于1947年冬，它开始是一个托名商业、开展学生运动的群众性组织。1949年4月后，该社大部分成员被吸收为“益青社员”，实际成为了“益青社”在桃江的据点。是一个借书店为名，受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外围组织了。建国后，完成了历史使命，其财产和部份人员均由桃江新华书店接收。但由于革命斗争的复杂性，一时真象不明，它遭受过错误的对待，甚至某些同志遭受错误处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才将其来龙去脉调查清楚，有关问题按政策精神落实了。正当新华书店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出于对党的感激之忱，我们通过亲身经历的回忆，写出这篇文字，作为桃江新华书店店史的一部份保留下来，确有其重要的意义。

二、大众文化社的成立经过

抗战爆发后，1938年9月，南京五卅中学迁来天津。它是一所完全中学，有学生800多人，教师50多人。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

蒋爱国斗争。当时五卅中学的学生不满蒋帮的黑暗统治，成立了“五卅中学校友会”。1947年2月，桃江一带的校友把组织扩大，改名为“桃江中学生学友会”，并在桃江福音堂召开了成立大会。推选周尚文、郭宗浩、邹鉴衡、徐润泉、昌汉凯、曾仲秋、袁达南等七位同学为负责人。决定以“加强联系，增进友谊，改造社会”为宗旨。工作方式是私人集资，经营书店，发展文化服务事业。

当时“益阳青年文化服务社”在桃江有一个分社，负责人汪正江。以人力、资金等原因，拟停业出顶。1947年冬，双方交涉，由学友会承顶过来，仍旧经营书纸业务。顶价是稻谷150担。承顶之后，店名未定。当时为了扩大业务，集足资金，由周尚文、郭宗浩、邹鉴衡、徐润泉、袁达南各投资稻谷100担，另由邹鉴衡负责向有关人士集资200担（集资者是昌汉凯、曾仲秋、吴汤佐、文智凡、文代凡、鲁德贞、文世豪、胡炳璋、吴克刚、徐雪帆、吴印潮、周如松等）共计稻谷700担。

1948年春初，湖大学生文星朗同志因亲戚关系来到我店，对我们进行鼓励。当时我们不知他已与党有联系，只知他是学生出身，是家乡人。谈话中得知他思想进步，倾向革命。他有意向我们建议书店定名为“桃江大众文化社”（1947年承顶时已开展业务，所以实际成立时间是1947年冬），又建议我们附设“刊物部”、“图书室”。随之正式作出人事安排：经理周尚文，副经理兼会计郭宗浩，营业主任邹鉴衡，营业员黄澍周、邹道如、吴树青、何少康、鲁德贞、段洪珍，学徒工曾荫高、石阳生，

地址桃江镇横街子。

以后积极开展业务,主要是销售中小学教科书、纸张、文具、学生练习本以及其他印刷用品和体育器具、图书等。较大的顾客是五卅中学(承包供应),还有湘山、广威、南京美专等;营业额年达稻谷500担。另桃江地段的小学,当时统计为541所,学生三万多人。桃林、桃源、舞凤等乡挂钩供应者多,碧螺、九岗等乡临时供应者也不少,营业额年达稻谷1500担,还有门市部日常营业年达稻谷700担,总计全年营业额稻谷达2700担左右。

这年我们还发行了《益友分刊》(借用长沙“益友”刊物之名,因原拟的《大众》刊名,向益阳县党部备案时未批准),由徐润泉主笔。内容为“讽刺时政”、“揭露黑暗”、“唤醒民众”、“风土人情”等。如周尚文、郭宗浩、邹鉴衡、徐润泉等共发表文章20多篇,影响较大者为《牛》、《被迫之声》、《从吃人说起》、《忤逆子》、《挖祖坟》以及《由不疑大众文化让谈起》等,有的还在湖南其他报刊转载过。每期印发500册,免费赠送。后因益阳县党部传讯查问,被迫停刊,仅出两期。

书店还办了一个图书室,有鲁迅、闻一多等进步人士著作和历史小说等。免费供群众阅读。1948年下期,还办了一个学习班,参加者30多人,有工人、教师、学生。以鲁迅作品为课本,组织学习和讨论,共同砥砺。每周星期六、星期日搞两个晚上,集中在福音堂学习。此亦为当局所不容,仅办了两年,便被迫停止。

三、参加“益青社”开展革命斗争

1949年2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周里书记派文星朗同志来益阳开展地下活动。4月，文星朗同志来桃江，吸收周尚文等十余人为益青社员。这时的大众文化社实质已变为益青社在桃江的据点，以后又秘密运来《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土地改革法大纲》、《将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让益青社社员传阅。

4月1日南京学生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紧接着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文星朗同志指示大众文化社派人到五卅中学组织学生起来响应。我社便派徐润泉同志到天湾发动学生于马迹塘举行了游行示威。

5月末希冀部属王叔和来到桃江，以湘鄂赣边暂编第三师独立第五团名义招募势力。王与周尚文是同学，文便暗示对王进行策反。周尚文发起与王拜结金兰，参加者有王叔和、周尚文、吴凯勋、胡炳璋、吴定远、刘文彬、周如松、郭家浩八人。王答应将五团人员改组，倾向革命。当时议定团长王叔和，副团长吴凯勋，其他人员大多是文化社的。军需经费由大众文化社供应一部份，接着派我社人员胡炳璋、周如松等40余人将王叔和存在汉寿的枪支200条运回桃江东林寺。

这时龚泽湘来桃江想组建湘中游击队第七支队，龚与吴凯勋为拜把兄弟，乃进一步策反王叔和去掉“第五团”番号归入游击队。王同意了，便在吴凯勋家召开会议，由文

星朗、龚泽湘主持，宣布七支队成立。吴凯勋为支队长，王叔和为副支队长，周尚文为秘书，胡炳璋为政工主任。后来又有桃林乡乡长吴清华交出步枪20多支，把吴让家里收藏的枪支也缴来了，七支队基本控制了桃江镇局势，对维护治安、护校、护店起了重要作用。

7月下旬，232师师长康朴派文智凡往松木塘向游击队劝降未成，即与五区专员潘佑强下令搜捕游击队和进步人士。7月11日文智凡全家被捕入狱。由于桃江大众文化社与松木塘游击队、七支队接触频繁，亦于同日被查封，许多益青社社员和游击队员遭逮捕，并有许多家属受到株连。幸省工会的大力营救，7月下旬，我被捕人员，全部脱险。

四、桃江新华书店成立

1949年8月3日，桃江获得和平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见到了光明。不久益阳成立了新华书店，桃江大众文化社经与益阳新华书店联系，请求派员接收。8月下旬，益阳新华书店的郑经理等同志来桃江，办好了接收手续，改名为“益阳新华书店桃江分销处。”全部财产（约值1000担稻谷）归分销处所有，原有人员，大部被留用，周尚文仍任分销处经理，郭宗浩仍任副经理兼会计，邹鉴衡仍为营业主任。至此“桃江大众文化社”走上了它艰苦战斗的历程，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夏家让〕

战时简报

张碧如

一九三八年秋，湖南省民众教育馆试验民校教师瞿然（又名周章）与中共地下党员方敬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曾国芳等，积极响应团结抗日的号召，毅然带职回乡，在大栗港开办战时民校。这所民校，实际上是当地的抗日救亡中心。“战时简报”就是他们刚到这里不久所创办的，它是当时的抗日宣传喉舌。其发行范围包括大栗港、鸬鹚渡、栗山河与竹金坝、蚌埠交界之区。它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针贬时弊，痛斥奸凶，深得广大进步青年群众的喜爱。

“战时简报”是简便发行的，采取油印方式，三日一刊。其主要内容是：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大力宣扬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辉煌战绩，还经常转载“中国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及“民协”、“民青”、“民联”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组织的抗日呼声，高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口号。激发各民族各阶层的抗日热忱，树立其抗战必胜的信念。

简报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揭露和声讨大汉奸汪

精卫、周佛海等一伙的卖国投降的丑恶行径，与当时国民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等具体计划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简报还遵照中共中央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积极宣传武装群众，建立和争取掌握抗日的合法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活动。“战时简报”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一直发行到一九四〇年。后因战时民校现“红”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办，“战时简报”亦不得不相应停刊了。

[责任编辑：夏家让]

广州起义亲历记

张 咏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广州起义。这是继江西南昌起义与湖南秋收起义后又一伟大革命行动。起义的领导者是革命先烈张太雷。指挥战斗的是叶挺将军，他是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转道香港来广州参加这一战斗的。起义的主要力量是留驻广州的广九罢工工人纠察队和广州工人队伍近万人，还有叶剑英将军率领的教导团。教导团成员，大都是黄埔四、五期同学，担任了下级干部，战士全是武汉分校黄埔六期学生。该校学生原由武汉出发，赴南昌参加起义，乘轮船至九江登陆时，被张发奎派部队包围缴械。张深知这些学生是反蒋介石的一支进步力量，可供利用与蒋对抗。但也怕留下后于己不利，经反复思考与开会商议，决定留下所有人员。派原是黄埔军校教官的叶剑英担任团长，改编为二方面军教导团，尾随张部到达广州，全团驻北教场①。

张发奎率部回到广州后，与汪精卫、陈公博等成立广州政治分会，陈等曾亲自到香港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项英联络，合作反蒋，企图稳住局势。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识破敌人阴谋，毅然拒绝谈判。

其时，桂系军阀白崇禧等与蒋介石联合图粤。张发奎旋即回粤主力部队组成西征军与之对抗，广州城十分空虚，仅留朱晖日师②担任广州卫戍。这给广州起义一个大好机会。

叶剑英所领导的教导团，借此良机，率部队到黄埔岛缴了黄埔本校学生的武器弹药，武装了自己。当时被关押在黄埔要犯司令部监狱里的十三名政治犯（连我在内）由教导团营救出狱。

我们获救后，立即晋谒叶剑英团长。叶慰抚有加，并将我们分配在学员班学习，因此便参加了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上旬的一天，广州市区忽有一辆汽车风驰电掣，散发“红旗刊物”。刊物头版载悬赏活捉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等六人，赏银十万元；杀掉的赏五万元；二版刊载的是汪、陈等求和信件全文。在同一天，组织上派我前往闹市中心的警卫团门前贴革命标语，策动这个团的部份人员起义（后参加了起义），这些革命行动表示着广州起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1927年12月11日午夜，广州起义的枪声终于打响了。我们在睡梦中惊醒，旋即接到出发的通知。刚刚走出房门，就见穿着睡衣的“参谋长”蔡某（张发奎派来教导团的反动监军），被枪毙在他卧房门旁。这时起义部队已分途出发，主攻目标是广州市公安局。当部队经过敌工兵团部门前时，门卫还是同平常出操时一样举枪敬礼，我们当即收缴了门卫枪支，向内打了一排枪。里面的人刚从睡梦中惊醒，就被全部收缴了武器。起义部队迅速转入市区同工人

武装相配合，一举攻克了德宣路卫戍司令总部，收缴了全部武器。首战告捷，鼓舞了战斗情绪。当天成立了广州人民公社，并建立起义军总指挥部，取得了广州暴动的初步胜利。

其时驻长堤一带的反动武装，尚未全部肃清。他们得到英、日舰队的支持，进行顽抗，气焰十分嚣张。

我与陈济民^③同学，一同参加了长堤中段靠近珠江大桥的战斗。这里是张发奎部第十二师留守处，因为存放的武器多，所以战斗很激烈。留守处有一个黄埔工科姓徐的同学和陈甚友好，我们想用喊话的办法，说服徐投降。我俩从街巷前往时，又跟上另一位战友，三人身背弹药，手握钢枪，急迅前进。靠近留守处一条巷口时，被敌方哨兵发现，当即举枪射击，进入剧烈战斗。因人太少，怕被敌人识破冲上，只得退回。因为我们是自由参战的，没有被分配下连队，经过一天的紧张战斗，我与陈济民仍返回北教场学员班驻地营房，度过了一个平安的晚上。

第二天凌晨，我俩又由北教场来到起义总部。这时卫兵司令是排长夏开烈，一见我俩，十分亲热。他拉着我俩的手说：“来得正好，一同去看反革命的下场去。”当走到大门外约200米的前坪时，见到一长列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尸体，堆积近一尺多高，象垒成的长堤一样摆着。这时，忽听到一阵阵紧密枪声。据侦察兵向夏开烈报告：“敌人西征军约一个师的兵力，已抵达观音山山麓；一个营的敌人正冲进市区”。情况突变，令人震惊。夏开烈立即以哨音集合部队，同时拖出两挺马克沁机关枪，架在总部门前，

准备迎击来犯之敌。我和陈济民及工人武装十余人商议，认为门前有卫队阻击，敌人无法攻入；我们便从后门出去，转到另一条马路上，准备侧击来犯之敌，以支持部队战斗。当我们火速赶到德宣路十字口时，战斗打响了。进犯之敌在我部机枪火力扫射下，遭受严重创伤，被迫向观音山方向败退。夏开烈率部尾追敌人，我们火速返回指挥部门前，见有许多升火待发的汽车，于是立即跳上一部车，要司机向观音山方向开去。沿途死者、伤者遍地，留下了刚才激烈战斗的痕迹。汽车驶至观音山战地附近，遇上教导团的几位战友拦车，一看都是熟人。他们说：“前方急需补充弹药。”便将汽车让给他们。忽听有位战友说：“夏开烈在追击敌人时，身中多弹牺牲了！”我们快步行至遗体停放处，见到以军帽覆盖着烈士脸部，有如生前一样，满脸透着红光和微笑，胸前与腿部布满殷红血迹。我们肃立默哀后，便大踏步朝目的地——观音山战地前进。

我们登上观音山主峰后，只见整个阵地，淹没在炮火硝烟中。远处敌军约一个师兵力，正如蚁集，向着山头派队轮流冲杀。而教导团一个营的兵力只200余人枪，坚守阵地，巍然不动。愤怒的枪弹纷纷向敌人射去。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我们来不及了解情况，立即投入战斗。眼红了，耳也被枪炮声震聋了，到黄昏时，我与陈济民两条枪的木托烧坏了，不能再射击，摸摸弹带上的子弹，也已用完。便撤离阵地，回到了德宣路总指挥部。原想换武器后，再上山参战，由于连续两天的激战，累得精疲力竭。当走到总部门前时，恰有一辆汽车停着，我俩进入车厢少